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论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的理论相遇

李璟 谌知翼

【摘要】迄今为止,媒介考古学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所考古的对象物上,没有理解媒介的基础上回应考古学的提问“媒介的存在条件是什么”。媒介生态学虽然形成了关于媒介的初步构想,却没有突出媒介居于系统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导致自身的理论想象力在一系列琐碎的个案中消磨殆尽。通过一批学者的尝试,两种理论资源表现出一种相向而行的趋势,在具体案例的操作过程中,它们在物质性、政治性和非线性等层面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可是从媒介理论的角度来看,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的靠近只是反映了一种表层的相遇。本文认为,二者若要真正形成汇流之势,就必须以媒介为起点,作为认识媒介本体论的两翼,来回回应媒介与人和世界如何共在的问题。

【关键词】媒介考古学;媒介生态学;媒介本体论;物质性;媒介性

【作者简介】李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谌知翼,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23)。

【原文出处】《新闻界》(成都),2022.7.54~64,96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卓越培育计划”(2021GYB07)。

半个世纪前,《理解媒介》(1964)一书问世,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媒介形式置于讨论的核心,不少学者对此难以理解,一时之间批评意见蜂拥而上,麦克卢汉掀起的短暂热潮很快退去。然而,随着当前媒介理论的兴起,麦克卢汉却成了不同学派共同的对话对象,它们无一不在尝试勾勒媒介的丰富内涵和本质。对于任何媒介理论或者媒介研究领域来讲,“理解媒介”至关重要,这体现了它们构建自身理论的基点。近年来,“物”“物质性”“媒介”以及“媒介性”逐渐成为当下媒介研究的一组核心概念,然而物并非天然就扮演媒介的角色,有时甚至展现出一种阻碍传播发生的“反媒介性”^[1],为了进一步厘清媒介与物之间的关系,媒介研究还需进一步的理论工作。

在此背景下,作为物质性思潮中典型的两个分支领域,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在尤西·帕里卡

(Jussi Parikka)和迈克尔·戈达德(Michael Goddard)的论述中表现出显见的共鸣与融通^①。可无论提起的是哪一个,映入眼帘的都是一张混乱的知识版图,因为以它们命名的两个学科都未成体系。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形式,所谓的“媒介考古学”横跨艺术史、建筑史、科技史、电影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等多种学科思想,基于一套流动的概念,展现为一个充满异质性的领域。所以摆在学者面前的通常是一些飘忽不定的理论构想,这种异质性在带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暗伏着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危险。与之类似,当“媒介”与“生态学”一词相关联,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形成了关于“媒介生态”截然不同的理论阐述,最为显著的分歧出现在北美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与欧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ies)之间。其中,后一种媒介生态学尝试对媒介问题进行哲学抽象,显现出不一一般的理论潜力和价值。

总之,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承袭不同的思想脉络,分别关涉时间与空间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表面看起来各不相干。那么,理论研究者为何主张关联两者?具体而言,他们将一种生态式的问题及思考纳入媒介考古的传统议题,又或者将媒介考古学的历史意识引入对媒介生态的考察,在二者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这样做意欲何为,又能取得何种效果?

事实上,这场理论联合尚在襁褓之中,帕里卡和戈达德等人并未阐明两种理论资源之间的共通性,而是在具体的分析中直接加以运用。当帕里卡在“生态媒介”(Eco Media)项目关联二者时,却对它们“何以交汇”含糊其辞。他宣称媒介历史是一部“可供性”的历史(a history of affordances),媒介考古的价值在于发掘媒介技术中的物质能量,及其可供性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考古学的概念溢出人类媒介的范围,说明了生态媒介项目的背景,不仅横向延伸到自然,也延伸到历史”^[1]。这种表述含混不清,令人困惑。媒介考古学究竟是什么,它如何处理历史经验?媒介生态学又是什么,它如何建立自然、文化与技术之间的横向联系?两者在哪些方面相互渗透、互为补充?

本文认为,只有在还原这样一种“隐秘”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理论阐释,才能充分发掘这场思想汇流背后的理论潜力,从而为理解媒介(物)概念提供更多灵感,为理解媒介及其文化提供知识增量。

一、陷入边界混乱的媒介考古学

2011年,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和帕里卡编撰了“有关媒介考古学的首部论文集”《媒介考古学》,次年,帕里卡又出版了另外一本介绍媒介考古学的作品《什么是媒介考古学》(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为了处理这一涉及众多学者工作的新兴领域,两部导论性文本铺陈了琳琅满目的媒介考古研究,以一种开放甚至宽泛的方式将各路学者集结于“媒介考古学”的旗帜之下。这些研究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共识,胡塔莫和帕里卡为了勾勒媒介考古学的全貌,展示了众多学者对“媒介”和“考古学”各种各样的使用,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于这样一个“四处游牧的学科”来说,澄清并限定基本的概念和方法是最为次要

的事情。显然,他们采取了一种“反向边界化”的策略,来为“媒介考古学”招徕人马,通过描绘一系列相关理论和实践,以期发展对该术语的间接讨论,颇为乐观地期待着理论发酵的可能。

针对《媒介考古学》一书,黄旦从“考古”和“媒介”两个维度进行了充分的解读,“该书将‘考古’解释为一种多元的历史书写,在‘媒介’的处理上,则是听任自然,不做必要的诠释。正是因此,全书缺少统一的概念框架,给人的总体印象不是在‘媒介考古’,而是在‘考古媒介’,发掘出各种不同的‘媒介’——好比‘与小人儿捉迷藏’”^[2]。这一批评准确地指出了“媒介考古学”实际上是一个缺乏认同且边界混乱的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同一术语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存在严重的主观化问题。在胡塔莫和帕里卡笼统的介绍中,所谓的“媒介考古学”既没有构成一种媒介思考方式,也没有为研究媒介提供一种方法论指导,倒是将自身的混乱暴露无遗。不过,在质疑“媒介考古学”这一术语的合理性之外,我们更关心的是究竟如何才能激活媒介考古学的理论潜力与创造力。为了在一片混乱中找准媒介考古学的方向,一方面需要反思“‘媒介’使用很是随意、随性和随便”^[3]的原因,另一方面应该在“考古”问题上标定出方法论准绳,在此基础上从媒介角度重新定位媒介考古学。

从更长时间的传播思想历史来看,媒介考古学作为一种特定方法和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些时候。早在1965年,C. W. 西拉姆(C. W. Cream)将考古学观念应用于电影史前史的研究,这种观念实际上与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目标并无二致^[4],而大约在同一时期一大批艺术-历史和文化-历史的文本,都是以一种明显的考古学姿态来运作。福柯之后,考古学作为人文学科中一种引人注目的主题和方法论范式,强势介入到各式既有学术流派当中,逐渐演变为某种学术尝试,媒介考古学中的重要一支就源自知识考古学。对于边界混乱的媒介考古学来说,同时存在各种书写或消解媒介历史的方法实践,包括传统的考古技艺、实证主义历史叙事、文化与艺术理论以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就说媒介考古学如何“考古”并无定式。可是“方法的选择总是生产被分析对象的方式”^[5],对媒介文化

的分析是一种认识论的操作,“什么是媒介”实际上是一个需要通过各种“考古”操作来回答的问题,所以从不同的“考古”维度出发,召唤和呈现出来的“媒介”必然不同。这也是媒介考古学作为一个“共同体”发展至今仍旧在各行其是的原因,以不同“考古”方法为导向,就压根不可能形成关于“媒介”的统一理解和构想,结果就是不同案例所考的“媒介”毫无规则章法可言。

正因如此,如果要从媒介理论的角度审视媒介考古学,就有必要收缩和限定我们对“考古学”方法论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关于媒介问题的独特思考。这一点帕里卡也略有提及:“重申媒介考古学的一系列‘流动概念’和自身‘游荡学科’的属性,但也要格外避免‘将游牧主义浪漫化’。”^[7]虽然《什么是媒介考古学》依旧没有明确回答书名中的问题,但是帕里卡在这里标定了媒介考古学应有的提问方式,这种提问应当是福柯式的,这为我们在方法论问题上的讨论指明了方向。他认为“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贡献在于:强调了一种挖掘存在条件的方法论”^[8],而福柯和基特勒在“考古学”方面的工作存在密切的对话,为媒介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纵观福柯一生的重要著述,贯穿始终的研究主题是反对起源、连续和总体性,洞察历史的断裂与不连续。在这一主题下,他通过“考古学”对历史遗迹进行内部描述,破除了进步与理性的历史表象,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话语实践。出于对传统史学的不满,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论在观念史的对立面确立起来,“考古学的描述恰恰是对观念史的抛弃,是对观念史的公设和程序的系统拒绝试图创造一种有关人类说出来的东西的、截然不同的历史”^[9]。为了解释这种“另类”立场,福柯紧接着提出考古学区别于观念史的方法论程式^②,这些方法论特征指向了一个基本提问:话语和话语实践的存在条件是什么?为了回应这一问题,福柯利用术语“知识型”对话语-对象进行系统描述。具体而言,话语构成的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所谓的“知识型”正是指西方文化特定时空中的规则系统,意味着“能够在既定时代把那些产生知识论形态、科学,可能还产生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连接起来的关系集合”^[10]。故而,“知

识型”是陈述功能运作的条件,也是支撑各个知识领域的概念基础。

不过在基特勒这里,“话语的存在条件”不仅涉及特定时期的“知识型”,还需考虑话语产生、传播和接受的技术条件,即“话语网络”。他认为福柯不应该完全撇开“媒介”,一头扎进图书馆丰富的资料和编目文献里去,因为“即使是书写本身,在没有进入图书馆之前,也是一种传播媒介,但知识考古学家却完全忘记了这一技术的存在”^[11]。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信息化的数据处理方法摧毁了书写对存储与传输的垄断,“话语分析已经不能穷尽知识与权力的诸种形式”。正因如此,福柯的历史研究未能在1850年之后取得进展,“当下的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he present)必须考虑技术媒介中的数据存储、传输与计算”^[12],也就是说必须为考古学工作增添更多媒介方面的理解,除了查阅档案之外,应当注意到特定时代关键的媒介形式。“知识型”界定了所有知识可能的存在条件——不管是通过理论表述的,还是在实践中默默应用的,而“话语网络”则进一步将“知识型”概念技术化,具体是指“一个文化构成了巨型的信息机器,根据数据输入、处理量和输出的联结方式,生产出关于机器为什么要这样运作以及应该怎么运作的观念”^[13]。

福柯论述的是“话语的存在条件是什么”,致力于话语之间的断裂、差异,致力于话语内部的法则和规律,不过他没有继续讨论产生断裂的原因,基特勒发现了这一理论缺口,并在此基础上从媒介角度思考话语断裂的原因,认为“技术上可能的操作决定了实际上什么可以成为一种话语”^[14]。换句话说,基特勒在挖掘知识与权力形式的构成时,更关心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科学和技术背景,媒介-技术被定义为调制这种权力关系的核心部分,于是考察技术系统和物质网络成为解读更广泛的历史文化问题的必要步骤。延续这一语意脉络,媒介考古学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是为了解读媒介技术的构成基础,以此锁定自己的研究问题即“媒介及其实践的存在条件是什么”^[15]。细究一下,从福柯的“话语分析”到基特勒以及相关媒介考古学的“媒介-技术分析”,所“考古”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媒介-技术”替换

了“话语”成为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媒介考古学的关注并非历史上错综复杂的“话语实践”,而是从过去到现在光怪陆离的“媒介实践”,这意味着研究者是从“过去和现在的纠缠”开始,对媒介及其实践进行描述。

那么,该如何对媒介及其实践进行描述呢?基特勒的考古工作具有示范意义,虽然他锚定的是单个媒介物(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但最终考察的是这些媒介的物质结构及其所构成的话语网络。基特勒笔下的媒介要么是在电的层面被统一起来,要么是在数字层面被统一起来,这说明他在理论层面讨论的只有媒介整体。这种思考体现了在哲学上影响重大的“1-3-1结构”,“一种原始的统一(精神化的语言)发生了内部分歧并最终分裂(模拟的分化加上打字机的机械化),但这个对立被更高层次的统一性(比如数字的复杂性)战胜了”^[16]。反观其他的媒介考古研究,大部分工作并未在整体抽象层面展开,“媒介”在众多研究中指向不明,甚至在具体案例中降格为纯粹的、单个的“物”,比如Baby Talkie、留影盘、西洋镜之类的物件,导致大量工作停留在为死去的東西撰写历史。这些研究仅仅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毕竟媒介历史提供了许多丰富的“旧日趣闻”,可是只是为了“好奇”而写作,必然会遮蔽一些更加关键的问题:特定的媒介技术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依据什么来重新思考它所表现出的秩序与异常?帕里卡对这种情况深感不满:“媒介考古学变得过于自吹自擂”,任凭好奇心作祟去发掘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存在严重的视觉盲区^[17],他认为对媒介考古的意义不在于讲述某种媒介物背后的故事,而在于表达“它们如何参与我们世界的构成”^[18]。显然,对孤立之物的讨论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这大大减损了考古学方法论的潜力,甚至将媒介考古学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其变成一门考证之学。

一般来讲,媒介考古学对陈旧的、过时的、重复出现的和被遗忘的媒介文化进行调查总是集中在“物”身上,“尽管有一些差异,但是许多考古方法都是围绕一种特定的媒介技术,或者一种媒介的话语领域(包括实践与技术)来建立自己的参考框架”^[19]。这说明媒介考古学至今为止考古的都是媒介物,没

有在理解媒介的基础上回应自己的问题即“媒介及其实践的存在条件是什么”。这也难怪有人质疑媒介考古不过是在历史的遗迹中到处挖掘“奇技淫巧”,它是否能兑现建构“另类历史”的承诺也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困于琐碎个案的媒介生态学

实际上,“媒介生态”这个概念早在不同思想流派中出现。在后麦克卢汉时代的北美媒介环境学者那里,“生态”一词承担的始终是一种“隐喻”的修辞功能,将媒介环境与生态环境进行类比,突出媒介环境对人的包围与限定。特别经由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及其继承者的发展,媒介与人构成一组二元范畴,媒介环境学旨在达到历史文化与人类感官的平衡发展,精神气质趋于保守和封闭。对此,戈达德直言不讳:“波兹曼渲染了一种民粹主义的技术恐惧症……面对形成技术统治的庞然大物,他给出的唯一解药则是一种相当保守的教育学观念。”^[20]在理解媒介技术议题时,帕里卡等人认为这种静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无法提供更多的帮助,真正进入他们视野的媒介生态学源自欧陆学者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的工作。

媒介生态学立论的起点是对媒介环境学的批判,这涉及到“环境”与“生态”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生态”概念自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发明以来,便以万物相连为基本原则,关注生物群落内部及其与环境的纠缠共生、相互作用,打破了“环境”一词背后隐藏的那种二元思维框架,即环境外在于人,形成与人的二元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吸收复杂性理论与系统论,研究者对“生态”的使用迅速走向复杂化,在“去自然化”的基础上与物质主义结盟,从自然生态转变为技术生态^[21]。在这一背景下,福勒选择用术语“生态”来描述媒介现象,正是由于数字技术实现了大规模的连接、协调和自动化,使得“当代媒介状况的核心在于复杂性、连接性和灵活性”^[22],而“当我们想要理解复杂和动态的联结的时候,生态学的问题就出现了”^[23]。

在福勒看来,“媒介生态”思想有助于处理当下这个软件与硬件、人类与技术、物质与文化相互纠缠,动态开放的数字时代。幸运的是,当生态学来到

福勒面前时,已经是一套较为成熟、可被直接征用的概念体系,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节点当属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生态哲学”(ecosophy)思想。对于加塔利而言,提出生态哲学不是对生态的思考,而是生态地思考(it is thinking ecologically),意味着在三种生态(宏观自然环境、中观社会关系以及微观精神生态)之间进行反复关联与交替互育,从而对“主体性进行复调的和异质性的理解”^[24]。基于此,媒介生态学坚决排斥媒介环境学那种“整体的方式”,致力于开发一种“复杂的方式”分析媒介现象^[25]。首先,正如生态学意义上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物圈的多级划分,媒介生态也分为不同尺度(scale),每个尺度都能产生并创造自己的关系维度,如物质、政治、美学等等,复合的媒介生态需要在分层拆解基础上加以研究。其次,媒介生态强调不同事物在不同尺度之间栖息、移动的能力,以及尺度之间的互动延伸过程。这一点同样是继承了加塔利对于不同尺度生态如何融贯的讨论,强调的是单个媒介对象如何在同一层次与跨层次之间实现互通互联。总体来看,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是“媒介生态”生成和运作的方方面面,比如:那些内嵌有技术、有机体、社会、精神的异质元素,如何展现出“媒介性”;不同元素之间如何合作以迸发出“组合性驱力”,推动媒介系统的生成;媒介系统又如何与外部环境、其他系统耦合,保证物质流动和能量交换。

上述操作透露出媒介生态学主张在系统中讨论媒介,由此点明了“媒介生态”概念之要义——媒介只有身处系统之中,连通同一尺度中不同类别行动者,以及发挥跨尺度的作用时,才成之为媒介。更明确地说,加塔利试图在关系本体论的层面构筑生态哲学思想^[26],这样的理论野心也流向了福勒,他试图为媒介生态学建立起一种“本体论方法”(the approach to ontology),这种方法要求媒介生态学整体地、综合地处理系统中的各类元素与各级尺度,因为它们总是互相纠缠,不可分离,所构成的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并且内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里,媒介并非先于生态、系统而存在的实体物,相反,媒介指向系统内、外部各组件之间非线性、混沌的相互作用,体现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利所描述的

“和的逻辑”(logic of the AND)——一种涵盖多个时空、关系的横向思维方式^[27]。福勒版本的媒介生态学颇受帕里卡青睐,他曾在一篇随笔中写到,“让媒介研究真正有意义的最佳方式是在媒介之外思考——跟随它的指引,它会扩展到哪里,就把我们带到哪里”,他甚至明言:“媒介研究处在一种很好的状态下,可以真正发展为对关系的研究,并在更广泛意义上对调节(mediation)进行研究”^[28]。以此观之,相比于传播学将媒介作为价值无涉的信道,福勒对于媒介的看法具备相当程度的革命性,与近来讨论“媒介性”的研究遥相呼应。

然而,媒介生态学对于“媒介”的描述始终是分裂且飘忽不定的。一方面,从各位思想先驱到福勒本人,都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媒介对于世界运作性的建构。若是借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说法,所谓“媒介”应是一种横向思维方式,可以生成一种“重叠的透镜”来观察“相互纠缠的集合体中的特定关系模式”^[29],这种关系模式可以说是不同元素的耦合,是一系列事件的触碰与转换。再结合福勒引用颇多的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来看,所谓“媒介”应当是一种具有自主意志的驱力(drive),这种驱力可以捕获差异与偶然,创造新的时空与情境,生成多尺度的生态并构成不同尺度生态间的转换与结合,最终使系统永恒地远离平衡,趋于根茎扩张与持续开放,直到无限。在此意义上,媒介可以说真正成为了“活生生的力的漩涡”,体现了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生成’不是融合、不是共存,而是一种转化,各自在媒介中成其所是,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态”^[30]。

另一方面,在福勒示范的诸多个案中,“媒介”似乎被完全等同为“系统”本身,而非“处在中间位置的‘调节机构’”^[31]。这种倾向从福勒的一些论述中便能看出端倪,比如媒介被直接定义为“是由多重部件、驱力及组合性条件所构成的装置”^[32],这种端倪在案例研究中被进一步放大。以《媒介生态学》(2005)一书中着墨最多的“海盗电台”为例,在福勒的分析下,海盗电台是一个由多重生态综合构成的媒介系统,包括由黑胶唱片、天线、场地等构成的物质生态,监管机构、寡头企业等构成的社会生态,以及数字化的人声与移动通讯带来听众知觉休克的精神生态。本质

上,这个典型案例无非就是去逐层拆解一个实体机构赖以存在的各种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客观来讲,这种做法纯粹是一种对异质元素的铺陈(福勒所谓的“清单列表法”),并没有真正去讨论系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生成与转换,也就无法真正触及媒介问题,即系统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它们的约束条件以及组合的可能性是什么?很大程度上,福勒背离了自己的理论目标——通过体现系统内的要素在不同时空中漂移、串联乃至引发突生,勾勒出多层叠生态间相互作用,进而系统最终实现自我突破,生成超越原有结构之物。在具体的案例操作上,福勒像拆积木一样将系统逐层还原到各种异质元素层面,对这些元素在不同生态层次之间所起到的“桥接”和“交转”避而不谈。这样一来,所谓的媒介生态实际上只是在谈论系统的各个部件,以及组成系统的各个生态层次,唯独不见居中调节的“媒介”,也就无从展现不同生态层次经由某种物质元素发生互动和转化的过程。

许煜在评述媒介生态学时,认为“系统之间结合的原则是关键”^[33],也就是说,光是描述系统分层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层叠之间相互干扰又合作的转换过程。如果只是将媒介看作是由多重部件构成的系统,又或是由多层次生态构成的系统,不去讨论媒介最为重要的特征“媒介性”或者“交转性”,便会陷入对一个封闭的系统的静态描述。在对系统进行具体描述时,福勒采取的策略令人感到困惑,他仅仅是将各种异质性元素陈列出来,而没有交代它们是如何在不同层次之间建立连接的。正因如此,福勒笔下的系统只能是一个个静态与完成时的封闭系统,难以呈现系统内部时刻上演着的生成与不确定。出于上述原因,媒介生态学至今没有通过案例分析将自身的媒介思想付诸实践,形成一种对整体性生态的动态描述方法,反倒是呈现了一批互不相干且琐碎零散的个案,比如海盗电台、照相机、集装箱之类的研究。

总体而言,媒介生态学关于媒介的理论构想颇具想象力,为媒介理论提供了一套新鲜有趣的概念工具。可是由于这种思想过于形而上学的飘渺气质,理论构想与经验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诸多琐碎的个案中,研究者将媒介直接等同为系统,居于

其中发挥交转作用的“媒介”又被遮蔽了。

三、相向而行,表层相遇

如果说传播学是在大众传播时代确立了自己的学科范式,那么到了21世纪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时代,到了媒介极其体系化、复杂化和网络化的今天,这种固定的、陈旧的研究范式已然危机四伏,国内外学界已经对现实的传播研究表现出强烈不满。作为上世纪人文学科中两种最引人注目的主题和方法论范式,“考古学”和“生态学”在传播学中的扩散初步表现出革命性意义,它们试图介入被主流传播学范式封闭起来的知识系统和解释主权,并通过批判性的、跨学科的反思维来激发和变革这些系统。在解构传播学主流话语的过程中,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的思想追求是一致的,它们对历史现象和当下现实的分析不是普遍的,而是多元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宇宙的,不是线性的,而是动态的。由于共同的精神气质,二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阐释中相互渗透、互为照应,比如:媒介生态学中经典的“海盗电台”案例就涉及大量的考古工作,本质上是一项围绕发射器、天线、麦克风、唱片、唱机转盘、耳机组合而成的媒介系统进行的档案与物质技术考察,颇有媒介考古学的意味和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之间存在一种相向性。

在一系列颇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想试验中,帕里卡和戈达德等人尝试了对媒介考古进行“生态式”的改造。首先,他们借助媒介生态学,将物质性议题推向更为彻底的非人类立场,强调任何考古工作都无法回避更加自然的维度。在一篇名为《脱离自然的媒介考古》的访谈中,帕里卡提到,“媒介的物质性甚至在我们谈论媒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与矿物、能量、特定的金属排列以实现通信、传输、传导、投射等的可供性或影响有关”^[34],因此,他认为媒介物质主义实际上可以走得更加彻底——基特勒对“文化技术”的论述只是基于已然成型的硬件设备、技术形式(如留声机、电影、打字机),而生态式的媒介考古要做的是将硬件、技术拆分为元素、矿物、能量等更加本质的物质,考察它们在不同生态层级中的流通与转换^[35]。也就是说,任何媒介技术的“诞生”都有赖于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死亡”也会造成某些

难以消除的环境痕迹,就其“一生”而言,本质上是属于自然的元素经由技术的中介生成,最终又循环回归自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及其实践的存在条件”不仅是人为的,更是自然的,那些“脱离自然的媒介考古”实际上又折回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无法对“更外部”的媒介现象进行考古发掘。为了避免这一状况的恶化,帕里卡呼吁:“对剩余物和残留物的任何考量,都必须包括其发生的更广泛的环境或生态。”^[36]以此为契机,一系列带有自然色彩的术语顺理成章地进入媒介考古的日常工作,用以考察物质材料如何与环境耦合,如何与其他系统交换能量以获得某种性质,进而成其所是,扮演起“媒介”的角色。

另外,帕里卡和戈达德等人对媒介考古学中的“政治天使主义”立场深感不满,相反认为“媒介实践总是政治性的,是人类和技术因素的集合表达”^[37],因此必须将媒介考古学与更广泛的政治议题关联起来(比如生态危机与环保,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等等)。一直以来,基特勒影响下的媒介考古学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忽视甚至蔑视政治和伦理问题^[38],这样的一种缺陷导致这些研究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39]。现实一再证明,“当在最初的技术层面允许时,媒介装配(media assemblage)并不一定成立,而只有当社会-技术集合体(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能够恰如其分地利用它们时,媒介装配才得以成立”^[40]。正因如此,如果“将科学和科学发明凌驾于社会和政治过程之上”,“完全抛弃社会和政治,或者至少将其降格为一种表象”^[41],那么媒介考古学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奇心展览柜”,展示着一些稀奇古怪之物。在帕里卡等人眼中,媒介生态学无疑是这一问题的“解毒剂”,它将媒介投入到所有使其成为可能的动态过程中去,在这种情况下,“遗迹仍然存在,繁殖,改变形式,重新排列”^[42],勾连起一张广泛的关系网络,这促使考古工作者将目光从“物”本身移开,延伸到事物之外,延展至定义物质载体的关系网络之中,去讨论“事物之外部”的重要物质与政治意义。考虑到媒介技术时代必然涉及权力议题,只不过权力的运作变得更为隐蔽晦暗,“权力不再仅仅通过空间场所和机构——如福柯分析的诊所或监狱——或语言实践来流通和再生产,而是发生在技术媒介系统所构成的

开关、继电器,软件和硬件,协议和电路中”^[43],媒介考古学很难再继续维持对现实议题那种冷峻甚至冷漠的态度,而需要将目光投向媒介的“社会生态”,“审视特定形式的调节所维持的实践、公众和社会性,以及它们对环境危害的不平等分配”^[44]。

因此,从物质性与政治性角度出发,帕里卡和戈达德最终建立起一种“生态式”的媒介考古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类和机器在特定的媒介装配中被连接起来”^[45],而且这些“机器”或者“硬件”内嵌于社会-技术-自然的集合体之中,必须从政治与社会角度加以理解。这种研究思路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事物的重要性在于其政治性,以及它们如何参与我们世界的构成”^[46],所以关注“信息技术涉及的跨越政治经济和自然生态的多重生态”^[47]必将成为媒介考古学“另一种模式”的应有之义。在生态学视野下,所谓的“物质性”既指软-硬件及其生产过程的物理性,又指向数字生产的物质条件,包括自然生态、社会关系、政治语境以及审美体验^[48]。这样一来,生态式的媒介考古开拓了新的方法论实践场所,不仅面向机器内部,同时涉及数字生产的整体生态,在复杂系统层面绘制当代文化的混乱本体,思考媒介介入自然、社会乃至精神之后如何作用于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以及权力关系,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和政治生产性。

与此同时,在引导媒介生态学从当代走向历史的过程中,媒介考古学在时间维度上的优势也逐渐展现出来。媒介考古学者围绕“重演”(re-enactment)、“递归”(recursion)和“拓扑性”(topology)等概念,致力于在历史沉积的时间叠层中开展媒介考古,发掘新旧之间的交错重演。对于他们来说,死去的媒介并没有真的死去,而是处于一种“潜在的潜伏(latency)和时间延迟(time delay)的状态”,随时可以被激活,被重演^[49]。历史上总是存在媒介复现的现象,同一问题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被反复讨论,但有不同的内涵和结果^[50]。在“昨日重现”的基础上,媒介时间表现为一种周期(cyclical)而非时序(chronological),一种复现(recurrence)而非创新,有助于在媒介变迁进程中找到断裂表象背后未曾变化的连续性内核^[51],比如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及文化遗产在当下技术环境中所扮演的基础性角色^[52]。

这种“非线性”的历史意识为一些以媒介生态学关切为主的案例分析提供了很大帮助。以艺术家加内特·赫兹(Garnet Hertz)的“死亡媒介”及其与帕里卡合作的“僵尸媒介”项目为例,他们考察了如何对死去的媒介(即电子垃圾)加以创造性利用,关注媒介复现如何在物质材料、社会心理、政治经济多重实践性生态中展开。尤其是,帕里卡在“僵尸媒介”项目中参考基特勒的物质主义和齐林斯基的“深层时间”(deep time)对媒介时间进行了再定义:“时间被含蓄地理解为潜能的持续重新定向和重新分配……时间不是从过去流向未来的一种流动,而是一种重点的不断转移,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利用过去的媒介作为未来可持续性的储备。”^[53]由此来看,当前数字文化中存在海量因技术迅速迭代、消费文化兴盛而产生的技术遗迹与电子垃圾,这些剩余物和残留物看似因过时淘汰而死亡,实际却并未真正消亡,甚至会以化学物质、有毒成分的形式永久地存留于地层之中,进而引发新的生态危机。这样一种兼具物质性、政治性与非线性的现象广泛存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不仅涉及媒介生态学领域,更涉及媒介考古学领域。

综上,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明显表现出一种相向而行的趋势——在操作某个具体案例时,它们总能在物质性、政治性以及非线性上互为补充。然而,二者要想真正在媒介理论层面汇流,还需要在媒介的理解上达成共识,揭示出媒介在构建一种整体性生态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这便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问题。

四、汇流:媒介本体论的两翼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媒介物质性研究无不呼吁:“对我们所身处的抽象文化中的物质形态进行更加具体、细致入微的分析。”^[54]这种思考始于海德格尔,在他这里物是聚集,展现了“物之物性”,天地人神作为一个总体都被物聚集起来。通过一种极具海德格尔个人色彩的术语,技术媒介与本体论的连接第一次得到阐明,媒介就是“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55]。基特勒注意到这一哲学史上的重大转变,由此提出“走向媒介本体论”的宣言。“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这句断言包含了一

个重要的观点,即“媒介构成了经验与理解的基本结构和准超验标准”^[56]。可以说,从海德格尔到基特勒,“媒介”一词所代表的不再是具体的可经验之物,又或者工具性的器物,而是逐渐形成一个可以在本体论层面加以讨论的抽象概念,在此基础上传播学科才真正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基础。

彼得斯这样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无处不在的计算要求我们从对媒介讯息的分析转向对媒介本质的分析,以及‘将自然视为一种媒介’的分析”^[57]。数字化是当前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数字统一起来的媒介网络组织并安排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媒介理论在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以媒介为起点来认识和反思我们这一时代本身,这意味着必须重视媒介本体论的问题,即媒介建构世界的本质。从媒介建构存在的角度出发,一种新的本体论生成了,它以媒介为起点,强调媒介的联结性和生成性,建构了一切事物。在媒介本体论这里,媒介建构世界的意义和重要性,远远超过它作为传播工具产生的功能和效果,媒介的社会角色从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载体变成了人类和社会存在的建构者。在媒介建构世界的过程中,它塑造出新的时间和空间秩序,在此基础上联结且重组各种不同的社会元素,生成并不断改变着一切社会存在。这样一来,我们讨论媒介考古学也好,媒介生态学也罢,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媒介本体论的认识论维度,将之用以解释媒介建构人类和社会存在的各种方式。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制高点,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发生了实质性关联,二者相知相通,走向一个整体性的学术平台。

在我们看来,重塑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关于媒介问题的理解,无疑是实现这种关联的前提。按照米歇尔(W. J. T. Mitchell)和汉森(Mark B. N. Hansen)的说法,“媒介”一词除了指出“人类在某一具体历史时刻所具有的各种单个媒介形式”之外,还指出了“一种技术的形式,或形式的技术,媒介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媒介性’(mediality),正是因为它,人类才变成了‘生物技术’形式的生命个体”^[58]。这说明为了回应媒介本体论的关切,不管是媒介考古学,还是媒介生态学,它们需要理解的“不是作为复数的媒介,

而是作为单数的媒介”，因为只有将媒介理解为整体集合意义上的单数形式，才可以关注调节(mediation)如何参与到人为分割开来的社会、审美、技术领域^[59]，也就是说单数形式的媒介才能形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帮助人们在分析社会变化时关注媒介所起的作用。

问题是，媒介考古学倚重乃至迷恋单个特定的技术物(medium-specific)，很多时候没有弄清“媒介”与一般技术物之间的关系，根本无法回答“具体的媒介物(medium)与浩若星河的被称为媒介(media)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60]。实际上，所谓媒介，关键之处在于“抽绎并蕴含着所有单个媒介(medium)都不可缺少的‘媒介性’(‘调节’)这一处在‘中间位置’所必然发生的机制和作用”^[61]。正因如此，一个合格的媒介理论必须(也只能)从媒介的调节开始谈起，包括它本身是如何调节的，如何让作为单数形式的媒介与作为复数形式的媒介在不同的过程中达成多种不同层次的调节。媒介生态学最令人感到欣喜的地方，正是福勒等人利用生态哲学来对“调节”的问题进行抽象运作，力图从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层面来描述媒介，“在它的触及和协调下，各种关系因连接而相互转化，因转化而形成新的形态或面向”^[62]。所以相较于媒介考古学，媒介生态学更接近一种媒介思考方式，关注到媒介在人与技术、物质与物质之间扮演的调节角色。只不过，后者的思考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气质，导致理论与经验难以弥合，在实践中存在只见“生态”不见“媒介”的问题，背离了媒介生态的生成性与不确定性，还有待进一步从媒介入射角来加以调试。

对于媒介考古工作而言，在挖掘“媒介及其实践的存在条件”时，任何脱离了生态的描述都会导致社会与政治语境的缺失，在对个案的描摹与叙述中重新构建起一种线性叙事，无法捕捉到媒介演变在历史中的偶然性，以至于媒介考古学所声称的革命性荡然无存。这便是当前媒介考古学必须寻求媒介生态学救援的根本原因。在媒介生态学的指导下，媒介考古学有望突出自身“后视镜”的理论特点——凭借对当下媒介生态的感悟，通过一系列档案和另类媒介，去还原历史中那些曾经出现又烟消云散的媒

介生态场景。“凡有媒介，就有发生，就有事件，就有变动，就有新的进展”^[63]，那些边缘、沉默、死亡的媒介也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媒介生态，只有回到这些丰富的场景之中，才能分辨出哪些物曾经短暂地介入过关系的建构，哪些物最后成为了媒介，展现出不同媒介特性所导致的不同“调节”状况和结果。换言之，媒介考古学必须以整体生态为起点，考察由媒介勾连的多重生态，发掘一个边缘之物的中心意涵，才能真正形成有关媒介的“另类历史”。

相应的，媒介生态学基于一种关系视角，对媒介生态的过程、流动、模态展开关注，这种视角是空间取向的，无可避免地忽略了时间维度，即过去之于现在的重要性。在这点上，媒介考古学为立足当下的研究补充了历史维度，通过识别在不同媒介时代反复出现的相似社会文化主题，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进入到当前数字文化世界，并随之共在的。确切地说，媒介生态学由于缺乏历史感，无法证明当下的媒介文化不是一种主题的循环或历史的规律，如果一个主题的相近性和相似性不能得到阐释，媒介生态学就会变成一堆破碎的个案研究，压根不可能进一步完善自身关于媒介性的思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媒介考古学提供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眼光，帮助媒介生态学回到历史维度，寻找不同生态场景生成与变换的潜在规律，从媒介生态史的角度为自己建立合法性。显然，媒介生态学不应该把讨论限定在已然定型的封闭系统内部，而是应该借力于媒介考古学，从反辉格史的历史叙述中发现媒介演变的偶然与突变，以此展现系统的永恒开放与生成。在不断生成与绽放的过程中，媒介构造出了无数个大生态与小生境，媒介成为了连接各个时空中不同尺度之间的对角线，成为了引发各种偶然与变动的驱力。简言之，只有站在当代去反思历史，并且让历史上的东西与当代发生关联，形成一种对历史规律的有效阐释，媒介生态学才更切近一种完善的媒介理论。

总的来讲，在讨论媒介本体论时，时间与空间是不可或缺的两个认识论维度，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正好在这两个维度上各有所长。正如戈达德描述的那样，“两种不同的实践变得难以辨别且相互干

扰……但有时一个相对于另一个更占优势”^[64]，一旦它们在理解媒介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以之为起点，一方便可借鉴另一方的生态观念，反过来另一方也可借鉴对方的叙述逻辑，两者相互支撑，去讨论在时间中的媒介生态和在生态中的媒介时间，更加完善地呈现出媒介在时空层面的作用机制。

注释：

①过去十几年间，帕里卡出版了媒介物质主义三部曲，包括《数字感染：计算机病毒的媒介考古》(2007)、《昆虫媒体：动物与技术考古》(2010)、《媒介地质学》(2015)。正是在一系列作品的开创性尝试中，帕里卡发现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之间潜在的一致性。于是，同时调动两者的概念资源、理论工具和方法程式，成为帕里卡认识当代媒介文化的独特取径。在2011年第17期The Fibreculture Journal上，帕里卡和戈达德围绕“非自然生态”组织了一系列文章，试图进一步阐明如何结合考古学与生态学来拓展媒介理论，如何通过自然及其历史来拓展媒介研究议题。这组文章试图引导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媒体生态学与媒介考古学的结合，如何提供一种方法论线索，以绘制当代文化的混乱本体。

②考古学不是一门解释性学科，它试图确定的并不是隐藏在或者显现在话语中的思想、再现、影像、主题、烦扰，而是话语本身、那些遵从规则实践的话语；考古学感兴趣的是话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不试图去重新发现连续的、不可察觉的转变，这种转变缓慢地将话语与它们之前的、周围的和之后的东西联系起来；考古学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与规则，而这些话语实践贯通、有时完全支配和操纵个体的作品。它认为话语实践是自主性的，抛弃了创作主体决定论；考古学并不试图追问话语的起源，而是对话语-对象进行系统描述。(引自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63页)

参考文献：

[1]胡翼青，马新瑶. 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考察[J]. 新闻记者，2022(01)：66-76.

[2]Parikka, J. Media ecologies and imaginary media: transversal expansions, contractions, and foldings[J].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11, n. pag: 34-50.

[3]黄旦. 媒介考古：与小人儿捉迷藏？——读《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J]. 国际新闻界，2021, 43(08)：90-104.

[4]黄旦. 媒介考古：与小人儿捉迷藏？——读《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J]. 国际新闻界，2021, 43(08)：90-104.

[5]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尔. 媒介考古学：方法与意涵[M]. 唐海江，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3.

[6]Starosielski, N., & Walker, J. Sustainable Media: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edia and Environment[M]. Copyright Year 2016:

200.

[7]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15.

[8]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6.

[9]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61.

[10]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226.

[11]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留声机电打字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5.

[12]Kittler, F.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M].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69-370.

[13]杰弗里·温斯洛普-扬. 基特勒论媒介[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19：46.

[14]Kittler, F.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M].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2.

[15]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6.

[16]杰弗里·温斯洛普-扬. 基特勒论媒介[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19：93.

[17]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162.

[18]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65.

[19]Parikka, J. Remain(s)Scattered[M]//Ioana B. Jucan, Jussi Parikka, and Rebecca Schneider. Remain.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32-33.

[20]Goddard, M. Towards an Archaeology of Media Ecologies: 'Media Ecology', Political Subjectivation and Free Radios[J].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11, n. pag: 6-17.

[21]Erich Hoörl.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ecology[M]//Erich Hoörl & James Burton ed. General Ecology: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2-5.

[22]Parikka, J. Digital Contagions: A Media Archaeology of Computer Viruses[M]. New York: Peter Lang, Press., 2007: 231.

[23]马修·福勒. 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5.

[24]菲利克斯·加塔利. 混沌互渗[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6.

[25]Goddard, M. Towards an Archaeology of Media Ecologies: 'Media Ecology', Political Subjectivation and Free Radios[J].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11, n. pag: 6-17.

[26]Erich Hoörl.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ecology[M]//Erich Hoörl & James Burton. General Ecology: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23.

[27]Taffel, S. Technofossils of the Anthropocene: Media, Geology, and Plastics[J]. Cultural Politics 1November, 2016, 12(3):

355-375.

[28]Parikka, J. Media studies—studies of relations, ecology, waste[EB/OL].(2011-03-11)[2022-02-16]. <https://jussi.parikka.net/2011/03/11/media-studies-studies-of-relations-ecology-waste/>.

[29]Taffel, S. Scalar entanglement in digital media ecologies[J]. *Necru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2013, 2(1): 233-254.

[30]黄旦. 听音闻道识媒介——写在“媒介道说”译丛出版之际[J]. *新闻记者*, 2019(09): 46-50+22.

[31]黄旦. 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J]. *探索与争鸣*, 2022(01): 142-148+180.

[32]马修·福勒. 媒介生态学: 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178.

[33]许煜. 媒介生态学(中文版序)//马修·福勒. 媒介生态学: 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5.

[34]Paul Feigelfeld. Media Archaeology Out of Nature: An Interview with Jussi Parikka[EB/OL].(2015-2)[2022-04-20]. <https://www.e-flux.com/journal/62/60965/media-archaeology-out-of-nature-an-interview-with-jussi-parikka/>.

[35]Parikka, J. *A Geology of Media*[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36]Parikka, J. *Remain(s)Scattered*[M]//Ioana B. Jucan, Jussi Parikka, and Rebecca Schneider. *Remain*.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12.

[37]Goddard, M. *Guerrilla Networks: An Anarchaeology of 1970s Radical Media Ecologies*[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28.

[38]Peters, J. D. *Strange sympathies: Horizons of German and American media theory*[J]. *Media and Society*, 2007, 15: 131-152.

[39]Geoghegan, Bernard Dionysius. *After Kittler: On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Recent German Media Theory*[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3, 30: 66-82.

[40]Goddard, M. *Guerrilla Networks: An Anarchaeology of 1970s Radical Media Ecologies*[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28.

[41]Goddard, M. *Guerrilla Networks: An Anarchaeology of 1970s Radical Media Ecologies*[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28.

[42]Parikka, J. *Remain(s)Scattered*[M]//Ioana B. Jucan, Jussi Parikka, and Rebecca Schneider. *Remain*.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15.

[43]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70.

[44]Starosielski, N., & Walker, J. *Sustainable Media: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edia and Environment*[M]. Copyright Year

2016: 10.

[45]Goddard, M. *Guerrilla Networks: An Anarchaeology of 1970s Radical Media Ecologies*[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28.

[46]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65.

[47]Hertz & Parikka. *Zombie Media: Circuit Bending Media Archaeology into an Art Method*[J]. 2015//Jussi Parikka. *A Geology of Med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141.

[48]Munster, A. *Materiality*[G]//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Digital Med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328.

[49]Ernst, W. *Radical Media Archaeology(its epistemology, aesthetics and case studies)*[J]. In Pau Alsina, Ana Rodríguez and Vanina Y. Hofman(coords.). "Media Archaeology". *Artnodes*. 2018No. 21: 35-43.

[50]Armitage, J. From discourse networks to cultural mathematics: an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 Kittle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 23(7-8), 17-38.

[51]埃尔基·胡塔莫, 尤西·帕里卡尔. 媒介考古学: 方法与路径与意涵[M]. 唐海江,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27-39.

[52]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165.

[53]Parikka, J. *Media ecologies and imaginary media: transversal expansions, contractions, and foldings*[J].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11: 50.

[54]Parikka, J.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87.

[55]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90.

[56]W.J.T. 米歇尔, 马克·B.N. 汉森. 媒介批判术语集[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导言 1.

[57]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奇云: 媒介即存有[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9.

[58]W.J.T. 米歇尔, 马克·B.N. 汉森. 媒介批判术语集[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导言 4.

[59]W.J.T. 米歇尔, 马克·B.N. 汉森. 媒介批判术语集[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导言 11.

[60]W.J.T. 米歇尔, 马克·B.N. 汉森. 媒介批判术语集[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导言 10.

[62]黄旦. 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J]. *探索与争鸣*, 2022(01): 142-148+180.

[63]黄旦. 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J]. *探索与争鸣*, 2022(01): 142-148+180.

[63]黄旦. 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J]. *探索与争鸣*, 2022(01): 142-148+180.

[64]Goddard M. *Guerrilla Networks: An Anarchaeology of 1970s Radical Media Ecologies*[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32.